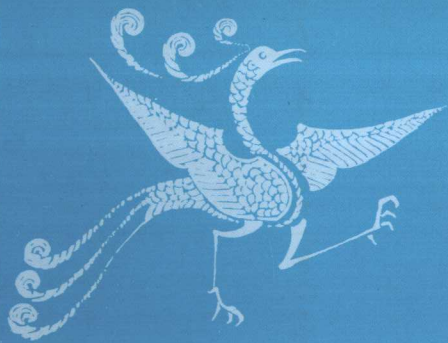


中 華 文 史 新 刊

古文獻問學叢稿



王華寶著

本書重點探討《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水經注》等史學文獻和《全漢賦》、《文選》、《搜神記》等文學文獻在整理校勘、詞語考釋、標點使用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對古文獻整理研究中涉及的校勘方法、原則等均有論述，并附闡釋章太炎、黃侃、徐復先生等學術大師的治學特色和學術成就的文章兩篇。是作者多年來從事古文獻整理與古漢語研究成果的選集，具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特色。

中華書局

中 華 文 史 新 刊

古文獻問學叢稿

王華寶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文獻問學叢稿/王華寶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09. 5

(中華文史新刊)

ISBN 978-7-101-06269-4

I. 古… II. 王… III. 古文獻學—研究—中國 IV. G25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20777 號

書 名 古文獻問學叢稿

著 者 王華寶

叢書名 中華文史新刊

責任編輯 焦雅君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張 15¼ 插頁 2 字數 200 千字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06269-4

定 價 36.00 元

序 一

周勛初

有專家指出，中國的學者主要集中在三大領域，一是高等院校，二是科學院系統，三是出版部門。這三大領域中的知識分子，因為職業的關係，治學上往往各有其特點。就以出版部門中人而言，其認真細緻的態度往往更見突出，而在古籍整理領域中工作的一些編輯人員，這一特點更為明顯。

清代的學術主流，俗稱樸學。樸學的主流為經學。而自乾嘉時起，治經必從小學始，已成學界共識。因此，樸學家強調讀書必先識字。漢字的形、音、義，都有許多講究，於是清儒又強調讀書不輕放過一字。古籍出版部門的編輯，每天都要接觸到古漢語中的文字問題，這樣也就自然地繼承了清儒治學的傳統，讀書不輕放過一字；遇到疑難之處，還要在字形、字音、字義等方面作出考辨。

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古籍遭到肆意踐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接近枯竭。中國步入改革開放階段之後，國人痛於傳統文化的瀕臨中斷，主管人文科學的部門乃制訂計劃，在高等院校內增設古籍整理方面的專業，有計劃地培養人材，這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起到了巨大作用。

王華寶博士就是在這一培養人材的大潮中湧現出來的一位年輕學者。他於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就讀於南京師範大學的古典文獻專業，畢業後就職於江蘇古籍出版社，其後他又師從母校趙生群教授攻讀博士學位，2006年又在改稱為鳳凰出版社的任職單位中取得編審職稱。由此可見，他是沿着規範的治學道路不斷攀登，且不斷取得成績的一代新人。

南京師範大學的古典文獻專業首由徐復教授、錢玄教授主持。徐復先生先後受教於章太炎、黃季剛先生，錢玄先生亦受業於季剛先生，正是所謂章黃學派的嫡系傳人。華寶親蒙熏沐，熟知清儒治學門徑，因此在他撰寫的許多文字中，不難發現清代樸學的流風餘韻。

但社會上總有一種偏見，以為古籍整理應是年老學者的事，皓首

才能窮經，年輕人能從事古籍整理方面的研究工作麼？實則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章黃學派中人不少就是年輕時就成名的。今從華實的這一《古文獻問學叢稿》來看，可以認為他在這一領域中已經取得可觀的成績。

《叢稿》內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史記》中的問題，第二部分討論史籍與《水經注》等典籍中的問題，第三部分討論的內容，如辭賦、《文選》、《搜神記》等，當今則歸之為文學。他對上述典籍的研究，關注之點偏於校讀、版本與詞語等方面，正屬小學的內容，這與目下盛行的所謂理論探討宏觀把握風氣迥然有異，實則此乃研究上述典籍的基礎工作，不能忽略不顧。須知閱讀古書而不知正確解讀文字，則每陷於六經注我，理論雖然高超，實則去古人原意益遠。

今即從《史記》、《水經注》、《搜神記》三種典籍的有關文字中各舉一例以明之。

華實於《史記》用力甚深，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以《史記》為題而撰就的，但後人要想在《史記》的整理問題上提出任何一點意見，也不容易，因為古今治《史記》者代不乏人，有關著作汗牛充棟。中華書局出版的《史記》點校本，迭經顧頡剛、宋雲彬、賀次君等名家之手，因此一直被學界視為典範之作，後人要想對此進一步探討，必須正本清源，從鈔本、刻本、點校本與自清儒延傳至今的各種資料與著作中發現問題，理出頭緒，然後作深入一步的糾謬與闡發。華實正在協助業師從事《史記》點校本的修訂工作，因此可從全書開端的《〈史記〉新整理本芻議》一文抉發的問題中，規測其功力。文中對點校本的底本、文字、版本、校勘、內容、體例等六個方面作了全面的探討，即以底本文字中的正訛而言，就有“訛文”、“衍文”、“脫文”、“倒文”、“徑移”等五例，且各舉佳例以明之。又如他在《點校本〈史記〉正文校議》中舉“刪改可商者”：《十二諸侯年表》：“齊平公驚元年：景公（子）[孫]也。齊自是稱田氏。”（680/4行2列）華實加按語曰：“點校本改‘子’為‘孫’，是依據《志疑》之說，確指平公驚為景公之孫。然‘子’有‘子孫’義，不確指。此敘血脈關係，可以理解為‘平公驚為景公的後代子孫。’於原文訓釋可通，不煩改字。”這種校勘，有關古代詞語的深入理解，需要具備訓詁方面的很高學識。梁玉繩為清代史學大家，《史記志疑》為治此學的一部名著，華實能對這樣的權威著作提出不同意見，足徵其學識已臻很高境地。今按：《荀子·正論》“聖王之子也”，楊倞注：“子，子孫也。”《廣

韻・止韻》釋“子”亦曰“子息”，足徵此說可信。

再以《水經注》而言，治鄴學者亦代不乏人，華實在《〈水經注〉新整理本之考察》中列舉自汪辟疆先生以來的諸家著述，且舉王國維、楊守敬、熊會貞、王先謙、陳橋驛等幾種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評述，說明他對前人研究《水經注》的成果曾下很大的功夫加以總結，故能深知各家之得失。當代的《水經注》整理自當以陳橋驛先生的點校本為後出的集成之作，然而由於原書內容複雜難治，此一新著亦難稱完善。華實舉陳書 273 頁“昔慕容雋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雋，光壽元年，齒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一段為例，細加辨析。按“雋”即“雋”，華實據《晉書·慕容雋載記》為說，可知此乃慕容雋光壽元年之事，“赭白”與“駿馬”為同位語，“奇相”與“逸力”為駢詞，故此文標點應正之曰：“昔慕容雋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雋光壽元年，齒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類似錯誤，華實起而糾正者頗多，此亦有益於治鄴學者匪淺。

干寶《搜神記》，為治魏晉志怪小說者必讀之書，研究宗教學者亦莫不關注。治此書者向以汪紹楹的整理本為善，然汪注實亦問題多有。如此書卷六“秦孝公二十一年”條內引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法苑珠林》卷八七《搜神異記》則作“方伯分滅”，汪氏以為當據此改正，後出的各種《搜神記》注本或今譯本，均從汪說。華實則以為“分威”文字無誤，且據《漢書·五行志》以明之。班固此《志》雖參劉歆之說纂成，然劉歆所據《洪範》九疇中之五行機制與京房之八宮卦系統相通，故《漢志》大量引用京氏之說，干寶又係京房《易》的傳人，故書中亦大量引用京氏之說。《漢書》中還多次運用“分威”一詞，表示臣下蒙蔽君主，《搜神記》中的問題實由“威”、“威”形訛所致。今按：《韓非子·八經》中《因情》曰：“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參言》曰：“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主威》曰：“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此說影響秦漢學人至巨。由此可知，汪氏校勘確有不當之處，此書實有進一步加工的必要。

以上略舉《史記》、《水經注》、《搜神記》三書為例，說明華實能在學界公認的點校名著中發現問題，糾正權威學者的錯誤，誠非易事。而這又可印證我在前面提出的預告，清儒提倡讀書不輕放過一字，這種可貴精神，在《叢稿》中有充分的體現，說明華實確是繼承了清代文獻

學家的優良傳統，這一新著可稱學術品質很高的一部新著。

華實在日常的編務工作中也作出了不少成績，如為《歷代賦匯》重編作者與篇名索引，發現原書作者、篇名問題嚴重，故所作索引撰一百餘條按語加以糾正。內如周渭，原書誤以為唐、宋間同名者有三人，華實細加辨析，證明全書所收三賦，實為唐人周渭一人之作。這種工作，對讀者最為有益。

我於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曾為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開設《近代學者治學方法》一課，講授王國維與陳寅恪等先生的治學方法，其時華實尚在南京師範大學本科學習，然每次都來旁聽，風雨無阻。以後我編《周勛初文集》時，華實即任責任編輯；前後出版的《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和學生余曆雄的聽課筆記《師門問學錄》，也都由他任責編，計算起來，前後歷時已有一二十年之久。由於業務上聯繫不斷，來往頗多，我目睹了他成長的整個過程，深知其成功之不易，故樂於為文以紹介之。

序 二

吳金華

當來自南京的 E-mail 中出現王華寶編審《古文獻問學叢稿》的時候，我頓時想起了馬克·吐溫的一段話：“人的思維是了不起的，只要專注於某一項事業，那就一定會做出連自己都感到吃驚的成績來。”揣想華寶一定也會認同馬克·吐溫的說法。

就我所知，華寶多年獻身於古籍出版事業，他不但在本職工作上勤勤懇懇，多所奉獻，而且在業餘的學術研究中也精進不已，取得了可觀的成績。謂予不信，這部《叢稿》就是一個見證。

《叢稿》作為文獻學與漢語史學術論文的選編，匯集了有關《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水經注》、《文選》、《搜神記》等文獻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真可謂洋洋大觀。承華寶盛情，他在《叢稿》的編輯過程中讓我先睹為快，並要我談談自己的印象；我想，早年我們曾經在一起讀點《詩》、《書》，說些《論》、《孟》，翫翫《周易》，談談《老》、《莊》，翻翻三《禮》、三《傳》，那時幾乎是天天見面，可是曾幾何時，人各一方，儘管我與華寶的研究興趣都投向了漢魏六朝文獻，但共同切磋的機會實在難找了；如今，既然華寶邀我作序，那麼，就此談談自己的觀感，以當連夕之談，也算略釋了久闊之憾。

一、流覽《叢稿》，我的總體感覺是：作者既重視古文獻、古漢語的本體研究，又重視古文獻、古漢語研究的理論建設，因而在論述問題時，不是凌空漫談，而是腳踏實地，故所論值得重視。

拿中華書局 1959 年出版的校點本《史記》來說，這部在海內外流行了半個世紀的權威性版本，在總體上勝過舊本是人所共知的；然而，校點本究竟存在着什麼樣的時代局限？今後對這個版本加以修訂應當注意哪些問題？要回答這類問題，那就只有對《史記》校點本做過深入考查的專家學者如華寶等等，才能言之有物，言之可信。最近十多年來，華寶針對《史記》校點本存在的問題，撰成了六十萬字的《〈史記〉整理研究長編》，並在此基礎上發表了十來篇學術論文，這些論文不是無關痛癢的高談闊論，而是實事求是的平實之言。這個特點，也凸顯

於被編入《叢稿》的一部分論文之中。例如，在古籍整理的理論與方法方面，作者基於對《史記》等文獻整理研究的實踐，在《試論〈史記〉校勘的原則》一文中不僅提出“編纂體例與史書校勘有所區別的問題”，還列舉了“史料辨別與底本是非的處理原則”等八條，諸如此類，都是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特別是未來的《史記》校點本修訂工作所必須關注的基本問題。

又如《漢書》在諸史中歷來號稱難讀，而《五行志》作為集中反映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觀念的文獻，它的語言研究價值一向為人們所忽略。打開《叢稿》中的《〈漢書·五行志〉考論》，我們在讀完充滿實證的全文之後，不能不相信這樣的結論：

就文化背景而言，《五行志》的出現，可以說是必然的，它是對先秦兩漢陰陽五行災異學說的一次總結。陰陽五行學說在古代的不同歷史時期乃至今天，對中國的政治、思想、科技、文化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不能不引起我們特別的注意。史書“五行志”一目，特別是《漢書·五行志》，其豐富的文獻價值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和發掘。

不難看出，這個結論所揭示的，是文化史、文獻史、語言學、詞典學等研究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問題。

二、細讀《叢稿》，我覺得作者在校理古籍和考釋古語方面，既繼承了傳統文獻學家、語言學家的理念和方法，又體現了現代闡釋學的某些特點。

傳統的考釋學，特別講究本證與旁證的互相支撐；現代的闡釋學，特別強調整體和局部的雙嚮循環，具體地說，就是當我們研究某一個問題時，必須把這個問題置於從局部到整體、又從整體到局部的反復考察之中。最近幾十年來，我曾看到一些以“校”或“校證”為名的新書，往往名不副實；因為這類新書中既有大量的失“校”現象，而所“校”之處又不向讀者提供必要的證據；更離奇的是，校書者甚至讀不懂所校之書，致使書中所加的標點符號錯誤百出。《叢稿》不是這樣。限於篇幅，下面從《〈漢書〉校讀拾遺》中摘錄一例：

校點本《漢書·儒林傳》：“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3601頁）按：此將田何與楊叔元、丁將軍並列，似有不當。上文云：“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3597頁）考之於史，

丁將軍即丁寬，為田何弟子；楊叔元為王同的弟子，係田何的再傳弟子，二人均不應與田何並列。核之文義，此處是先總說“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以田何學說為宗，後分說楊、丁二家同出一門，故“大誼略同”，而京房與楊、丁稍異。因此，“田何”下之頓號當改為逗號。

上文所校正的，儘管只是《儒林傳》中一個小小的頓號，但作者既有“上文”作為本證，又有“考之於史”的內容作為旁證；“上文”來自《漢書》的局部，而“考之於史”的內容則來自歷代文獻這個整體，這個整體包括《史記·儒林列傳》、《後漢書·儒林列傳》、《隋書·經籍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序》等一系列文獻。毫無疑問，要發現這類標點問題並予以解決，既須具備微觀的分析能力，更有賴於宏觀的整體通識。凡是富有實戰經驗的古籍整理工作者都十分清楚，在疑難的句讀背後，往往隱藏着許多複雜而誘人的課題，上文所謂“頓號當改為逗號”的問題就是這樣，它表面上是一個標點糾紛，骨子裏卻關係到文化史特別是《易》學史的解讀。

三、就古籍校勘的實踐而言，《叢稿》展示了文獻學專家發現問題的敏感和攻堅突固的功力，創獲之豐，以《史記》校議諸文為最。從《叢稿》中收錄的《史記》論文可以看出，作者的貢獻至少可概括為三個方面：（一）作者用局本跟點校本（第2版）仔細對校，發現了許多有待研究的異文；我們如果由此推進，便可以發現兩版均誤之文。對於《史記》點校本的修訂工作來說，這是一項基礎工程。（二）在文字形式及排版格式上，指出點校本中不合規範或不甚合宜的現象。（三）對點校本的疏失多所指正。例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師古曰”下面的“集解”二字當為衍文，《河渠書》“北渡汙兮浚流難”的“汙”應作“逗”，《五宗世家索隱》的《說解字林》應當讀為《說解》、《字林》，凡此種種，均發人所未發。尤其引人矚目的是，作者縱筆之時，每每穿雲裂石，益人神智。這樣的例子當然不限於《史記》的校讀，諸如《搜神記》“分威”的校議之類，無不宛如庖丁解牛，老吏斷獄，令人拊掌稱快。

四、作為一部有現代意義的學術著作，作者着眼於梳理古籍中的疑難之處，可圈可點之處指不勝屈；不過，任何一部高水準的學術著作，在責備求全的讀者眼中都不可能毫無疑義，因此，我覺得《叢稿》中的個別結論，可能還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請看《漢魏六朝語詞研究考論》中一則：

校點本《宋書》卷三二《五行志三》載晉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事云：

“丙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庫皆災。”(936頁)按：《詩經·周南·螽斯序》：“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則百，語出《詩經·大雅·思齊》：“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毛傳：“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後世因以“螽斯”、“則百”為多子之典實。本處是並用二典作堂名，不必斷開。最明顯的例證如，《晉書·劉聰載記》記劉聰名其所居為“螽斯則百堂”，寓含多子昌盛義。他如《後漢書·皇后紀下·順烈梁皇后》：“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可以參證。

上文既上溯《詩經》以求“螽斯則百堂”得名之由，又以歷時性資料《後漢書》、《晉書》為旁證，鎖定《宋書》標點之誤，有理有據，其說甚辯；但我還是覺得《宋書》的斷句未必有誤，倒是校點本《晉書》卷二七《五行志上》作“螽斯則百堂”而不點斷卻值得懷疑。懷疑的理由如次：首先，《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有云：“元嘉十四年二月，宮內螽斯堂前梨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聞。”其中“螽斯堂”是獨立的堂名，這是《宋書·五行志》的共時性資料。其次，《藝文類聚》卷六三《居處部·堂》引《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祿堂、承慶堂、仁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昌堂、椒華堂、芳音堂、永光堂。”其中“則百堂”在前，“螽斯堂”在後，顯然是兩個堂名，這也是《宋書·五行志》“晉太元十三年”的共時性資料；再次，影宋本《太平御覽》卷八八三《神鬼部·鬼》引《前趙錄》曰：“麟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災，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絕。”《御覽》原無標點，我之所以在“螽斯”下面用頓號，是因為下文有“二宮”兩字的提示；總之，“螽斯則百堂”五字到底是一個殿堂的名稱，還是兩個殿堂的名稱，根據現有的資料看，我暫時傾向於後者。不知華實以為如何？

以上四點感想，特別是第四點，是不是對頭，我不敢說。若有不當，敬請讀者批評，也請華實不吝指正。我與華實相識，屈指已有二十多年了。當初他在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專業學習時，就為徐復（鳴謙）、錢玄（小雲）先生等著名文獻學家、語言學家所獎拔。後來他以優異的成績被推薦到江蘇古籍出版社工作，跟學術界的接觸日益廣泛，學術理念與研究能力也與時俱進，在同輩中實為先鋒，在同行中堪稱翹楚。最為難得的是，華實為人厚道，為學誠實，頗有鳴謙、小雲諸先師的流風餘韻；其《叢稿》以《一代宗師徐復先生》作結，正折射出他的人格追求和治學蘄向。由此，我又想起了鳴謙先生在拙著《古文獻研

究叢稿》序言中的呼籲：“不失舊學之精義，勇於前途之開拓。”謹錄箴言，願與華寶共勉。

2008 年 12 月於復旦大學
時年六十有六

前言

在學習古典文獻和從事古籍編輯工作的過程中，對遇到的古籍整理和詞語考釋等問題做點札記，或就具體問題做點研究，並將一得之愚訴諸筆端，一晃已二十多年。近時從業已發表及尚未刊出的叢稿中選取部分以考據為主的文章編成一集，是為了便於向廣大讀者請教，同時作為對無數曾關心幫助我的師友的回報，作為敬奉先師徐復先生、錢玄先生在天之靈的一瓣心香。

本集共收文稿 30 篇，約分為四組：第一組主要是對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進行的較為全面的探討；第二組主要探討《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水經注》等史學文獻在整理、考釋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綜合研討中國書院志的學術價值；第三組主要探討《全漢賦》、《文選》、《搜神記》等文學文獻在整理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第四組（附錄部分）對學術大師章太炎、黃侃、徐復等先生學術特色和學術成就進行研討。下面對一些主要文章做點介紹。

《〈史記〉新整理本芻議》是 2002 年 4 月參加中國史記研究會第一屆學術討論會的論文。當時我正在以《史記》金陵書局本與中華書局點校本做全面的覆校工作，已感到點校本與其底本金陵書局本有很多異文。經過一番思考，認為“對《史記》有重加整理的必要”，並提出“宜從文字正確、校勘精當、內容完整、體例科學、標點準確、體現現代史記學研究水準等方面着眼”的建議。此後便在趙師生群先生的指導下，對《史記》做較為全面系統的校勘工作。對校工作用了 11 個月，然後用了半年的時間，將張文虎《校刊〈史記〉札記》與點校本逐條對比一遍，同時廣泛收集《史記》研究的各種成果，特別是最新成果，做了二十多萬字的讀書札記，至 2004 年初，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史記〉校勘研究》。過去學者對點校本十分信從，甚至有迷信傾向。而從中華書局新近披露的材料看，宋雲彬先生以清金陵書局本為工作底本，參考顧頡剛先生等的整理本，進行校勘標點，最後形成了《史記》點校本。筆者根據掌握的材料，進一步說明“點校本存在着底本校對不精，某些文字處理不合古籍整理規範，漏校、誤校不少，已有研究成果吸收不

夠，標點可商之處不少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有必要在科學的方法指導下，充分吸收學術新成果，對《史記》文本重新進行較全面而系統的宏觀考察和微觀剖析，推出新的《史記》整理本。同時指出“對任何筆路藍縷者都不應該提出過高的要求，點校本發揮的歷史作用仍不容低估”。第一組論文基本是近幾年的讀書札記，多為散論，而《試論〈史記〉校勘的原則》一文，則試圖討論《史記》校勘中的一些觀點、方法和原則，希望豐富校勘學理論特別是古文獻學基礎理論。該文提出的八條原則：（一）編纂體例與史書校勘有所區別的原則；（二）史料辨別與底本是非的處理原則；（三）疑案考辨與文字校勘的關係問題；（四）訓詁修辭與文字校勘的區別問題；（五）對待班馬異同的原則問題；（六）版本異文與語言文化研究的關係問題；（七）有謬必糾與疑古過勇的關係問題；（八）實事求是、多聞闕疑的原則問題，多數為古籍校勘工作中共性的原則問題。《點校本〈史記〉正文校議》則分類討論《史記》正文中二百多條疑誤之處。需要說明的是，做《正文校議》時力求系統全面，故所舉條目與本人其他文章不避重複交叉，現在各文收入一書，則不宜重複，因此對相重的條目儘量刪除，另有《〈史記〉整理平議》等文也未收入本集。

《〈漢書·五行志〉考論》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討論：一、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五行志》整理中存在的問題；二、從《漢語大詞典》中存在的立目、釋義和書證問題等，談《漢書·五行志》的語料價值，藉以顯現“五行志”的文獻價值；三、對“五行志”一目的設立的基本認識及其價值重估。《南京圖書館藏〈三國志〉版本簡論》是2002年11月在復旦大學召開的首屆《三國志》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通過對言南金批校本《三國志》等的初步調查，說明“不少《三國志》版本至今沉睡在各個圖書館，有待當今學者去進一步探討”，“換一個角度看，《三國志》整理研究仍大有可為”。《〈水經注〉新整理本之考察》，對20世紀後期問世的五種《水經注》新整理本逐一加以考察，探討各本之得失；《三版〈水經注〉標點商兌》，對三個新整理本共同存在的26條標點問題細加剖析；與王勇博士合撰的《〈水經注校證〉校讀札記》，對2007年新出版的整理本提出一些疑誤之處加以商討。這種跟蹤研究，或對鄴學研究、對編纂適應時代要求的《水經注》新版本不無益處，對當今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不無啟發。我個人保守地認為，就古籍整理來說，做到底本選擇得當，參校版本合理，吸收成果到位，富有個人創見，體例基本

完善，標點比較準確，即可以算是“一次新的攀登”，體現了當代最高整理研究水準。

漢賦與《文選》的研讀，主要是為了自我訓練，滿足閱讀興趣。當時做了許多札記，僅整理出幾篇小文。《賦體文獻與〈歷代賦匯〉》則有些職務發明的意味。鳳凰出版社重印《歷代賦匯》，姜小青總編輯請程章燦先生撰寫《賦學文獻綜述》，請王琳先生等編撰《辭賦研究論著索引》，考慮到何新文先生曾提出“一些規模較大的總集如《全漢賦》、重印的《歷代賦匯》等，還沒有來得及編附‘篇名索引’和‘作者索引’之類應有的資料。如此等等，當然有待於進一步修訂和補充”。本次重印《歷代賦匯》則盡力彌補此不足，由筆者增加“《歷代賦匯》作者與篇名索引”。然書中的疏失給編制索引帶來不少的麻煩，我參考有關文獻和工具書，在索引中加了一百餘條按語。本文舉出一些誤例，如“本書所標作者姓名及所屬朝代多有訛誤”，“本書所收賦有缺作者姓名者”，“有缺作者所屬朝代者”，“本書所收賦有誤分一篇為二篇者”，“有前後重收者”，還有“一人誤分為數人”，等等。《漢魏六朝語詞研究考論》是古文獻整理與古漢語研究、辭書編纂相結合的一篇習作。通過考釋部分詞語，結合《漢語大詞典》等大型工具書在立目、書證溯源、釋義等方面的可商之處，討論了漢魏六朝文獻整理中存在的問題，並強調應當加強對漢魏六朝文獻尤其是漢賦語言研究的重視。《搜神記》的校讀工作始於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持續至今。《〈搜神記〉汪校補正》是本集中發表時間最早的一篇習作，在吳金華老師的指導下修改多次，老師的恩情至今難忘。至於該文後來列入一些目錄或參考文獻，為一些《搜神記》整理本所採用，那當然是過於所望的事情。續作四篇，亦是不斷關注此書的結果。剛出版的李劍國先生輯校的《新輯搜神記》，運用新的古籍整理方式，為學術界提供了新的《搜神記》讀本。初讀之後，我就思考可否將《新輯搜神記》作為一種古籍整理範例來研究，探討這種整理方式對《搜神記》是否合適，可否推及其他古籍，新輯本輯校原則與方法是否得當，重新分類編排是否得當，對各種文獻的取捨、異文的取捨有無問題，在文字校勘和標點斷句方面是否到位，等等。因正在做其他事，一時還無法成文。略記於此，希望同好者來共同探討。

至於研討章太炎、黃侃、徐復先生等學術大師的治學特色和學術成就，是為了尋求讀書學習的方向感。通過與這些大師的親近，來感

受悠久的學術傳統，尋求厚重之所在，以不斷反省，有所依歸。《一代宗師徐復先生》一文中所說：“了解老一輩學者的學術經歷和學術活動，學習他們的研究成果和治學精神，探討他們的學術貢獻，繼承並弘揚前輩的優良學風，無論是對推動具體學科的發展，對端正當代學術方向，還是對弘揚學術文化精神等，都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最能體現我的想法。

過去撰稿，雖說不夠成熟，但多有老師審閱把關，一般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現在下筆時不乏自信，可過不了多久就會發現有些地方應當補充甚或修正。雖說是與時俱進，“覺今是而昨非”了，但對自己寫的東西總感到難以滿意，故而又有些不敢出手了。積累的疑問漸多，讀書的壓力就更大。借本次結集出版的機會，向廣大讀者請益，敬請專家學者惠予指教。

王華寶

2008年元月

目 錄

序一.....	周勛初	1
序二.....	吳金華	1
前 言		1
《史記》新整理本芻議		1
《史記》點校本訛誤辨正		14
試論《史記》校勘的原則		21
點校本《史記》正文校議		32
點校本《史記》標點問題舉隅		73
《史記》三家注音切疑誤辨正		81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與《文選》校讀札記		83
《史記》校點補遺		86
《漢書·五行志》考論		89
《漢書》校讀拾遺		98
《後漢書》勘誤二則		100
南京圖書館藏《三國志》版本簡論		101
《三國志校詁》述評		107
《晉書》校點志疑		111
《水經注》新整理本之考察		113
三版《水經注》標點商兌		122
《水經注校證》校讀札記		127